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

所谓敏感问题,就是在某个时空内能迅速引起人们生理或心理反应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敏感问题常常是点和改革深化的关键点。评论如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就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进步。文章能够触及群众所关心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又给予了回答,那么,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作用,得到最大的所谓心理承载力,是指人们对外部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社会舆论、社会舆论、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反应能力。行为方式有较强的适应性,对面临的改革有较强的心理承载力。因此,人们处于长期停止改革的环境中,即使遇到较小的改革,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震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改革政策和增长。由此可见,涉及敏感问题,提高广大读者(包括领导者和广大群众)的心理承载力,是讨论的

# 社会进程中的 新闻学探寻



YZLI 0890088006

赵振宇◎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 430074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

# 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

赵振宇◎著



YZLI 089008800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赵振宇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09-6758-5

I. 社… II. 赵… III. 新闻学-研究-中国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767 号

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

赵振宇 著

责任编辑:曹 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祝 菲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1 插页:2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一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是臻于成熟之时。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紧密联系,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研究占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1978年,中国恢复新闻学硕士生教育;1985年,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有了博士后流动站。目前,中国内地共有新闻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师队伍达到万人的规模,其中教授约

1000人。加上由他们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新闻传播学科的文献传布和学术交流方面有着强烈需求的学人群体人数当以十万计。

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在五大洲各国,还有一大批主要聚集在各高等院校的华裔、华人学者从事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他们或以汉语华文,或以所在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学术交流和撰述,并且十分关注汉语华文的新闻、传播。他们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特别注意收录这批学者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文丛以“中华新闻传播学者”而不以“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冠名,其用意也在于此。中国内地出版的系列文集,注意收录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将海外华人学者纳入大中华的学人序列,在海内外华人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中,这一做法是颇有见地之举,值得称道。

“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首倡其事,并具体组织实施。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于1983年创办新闻系,在中国开理工院校办新闻教育之先河。建系伊始,他们就制定“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方针,走特色取胜的道路,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的能力践习等诸多环节上有所创新。1998年,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强力推行人文社科研究与最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的大跨度交叉,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传播文化与传播科技结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特色取胜的办学理念,并不断强化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已是一个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全功能结构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基地,在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上,也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出版“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既体现学院主事者致力于新闻传播学科基础建设的战略谋划,又反映了他们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渠道畅通而奉献力量的良苦用心。对此,我是颇为赞赏的。

学术共同体可以分为一些级。全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可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各一级、二级、三级学科旗下的学者也可以视为某一级上的学术共同体。就新闻传播学科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院校教师占学者群体的绝大多数,而重点高等学校出于办学的需要,在学科下的专业设置上一般有求全的倾向,往往在一所学校形成一个学术面向大体覆盖学科全场域的教师组合,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处于级层基础部位的学术共同体。“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第一批著作主要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写。他们和他们在该学院的同事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学术共同体。这一批著作的研究内容,既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涉及新闻自由与法治这样紧迫而敏感的问题,又涉及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涉及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进程的当下现状考察;既有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深入思考,又有新闻传播文化意义的多方位阐释;既有政治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媒介社会学等新闻传播学新学科的开拓性探索,又有以新的视角对传统的报纸传播、电视传播和现代的新媒介传播的解读;既有紧密联系市场经济的品牌传播研究,又有贴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中不乏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独具只眼、直面现实之作,相信能给读者带来多方面的启迪。

我与这一批著作的作者都曾有过接触、交往,与其中一些作者更是在各类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过从甚多。华中科技大学位于中国腹地的武汉市,这些作者在荆楚文化的熏染下献身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勤奋、执著、“应物不滞,飨己有规”,我是有所闻,更有所见的。读到他们收入文丛的著作,“绿叶素荣,纷其可喜”,使我感触良多。“漾文澜而日富,扩学库以逾宏”,是我对他们的殷切期望。

我更希望“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推出计划中的后续批次,为全国、全球的华人新闻传播学者开辟一方“曾枝剌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学术园圃。

是为序。

方汉奇

2010年6月于北京

## 总序二

华中科技大学,曾先后用名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1983年,华中工学院创建新闻系,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办新闻教育的理工科院校。办系的倡议者和推动者是朱九思院长,他认为理工科院校应该办文科。1998年,新闻系改组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据说院名是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周济教授建议的,他认为21世纪是信息化世纪,而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相结合的效果最佳。还有老校长杨叔子院士,也是新闻教育的积极支持者。这些情况表明,华中科技大学的领导人在办学上是有远见的。

远见要成为现实,需要有多种条件和多方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华中科技大学及其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很快组成了一支阵容整齐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们工作与生活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的氛围中,为培养人才和建设学科而辛勤劳作,使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出版这套自选集正是为了“积学以储宝”——记录教师们的业绩与智慧,并发扬光大。

自选集是自定篇目的,具有鲜明的个性。但全套自选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这种共同之处体现与渗透在各部自选集之中。我以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这套自选集的共同之处主要是显现了自由、务实的学风。所谓自由,即学术自由,自由选题,自由论述,自由讨论;所谓务实,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重实证,重案例,重材料。这也许是由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之光芒的折射,我们在阅读这套自选集时可以领略一二。

此前,我国已经出版过几套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的自选集,影响不小,效果很好。这是因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后起者,学术积累不多,其研究成果理应加速面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迫切需要这种学科作理论向导,所以多出有关著作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这套自选集的出版,对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是一项重要贡献,值得热烈欢迎!

丁淦林

2010年6月于上海

## 总序三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大职能。教学离不开科研,高质量的教学需要高水平的科研做支撑,故世界一流大学均把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就是从事新闻教育的大学教授们科研成果的集萃。

在大学神圣殿堂里,新闻教育属于新生代。在世界范围,如果从沃尔特·威廉姆斯 1908 年创建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算起,至今才刚过百岁;在中国,一般把 1918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至今还不到一百岁。与有 900 多年历史的法律教育、神学教育等比较起来,新闻教育实在是年轻得不能再年轻了。虽然年轻,但是“后生可畏”——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新闻教育在世界各国得到认可和普及,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环境魔幻般的演变,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和形成了不同的新闻教育模式,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以支撑起本国的新闻事业发展。

世界新闻教育虽然有几种不同模式,但我注意到,无论哪种模式,成功的新闻院系的教育活动都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注重实践性,强调人文性。所谓实践性,就是高度重视教学实践环节,在新闻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能力——包括新闻事实的发现能力和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在内的新闻产品的制作能力,为此,新闻院系将办专业与办媒体并举,把新闻教学过程与新闻实践过程融为一体;所谓人文性,就是高度重视人文主义素质,强调新闻伦理教育和新闻精神培养,为此,新闻院系将职业伦理和法制课程作为重要教学内容,把新闻记者的责任感、道义感贯穿于新闻教育过程的始终。

新闻教育这两大特征是由新闻学的性质所决定的。新闻学是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新闻产品制作过程与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属于一门应用型人文学科。当年,新兴资产阶级先驱们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高喊着“出版自由”的口号,以刚刚诞生的报刊为武器,以争取“出版自由”为突破口,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进攻,掀起了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阵狂飙;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逐步成熟,新闻传媒纷纷离开政坛,回归市场,走上企业化发展道路,廉价报纸的诞生,掀起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二阵狂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报刊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但是,过分的市场刺激,使黄色新闻泛滥成





灾,一场“道德保卫战”随之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诞生并走向成熟,新闻教育开始跻身大学讲坛。普利策等人呼吁,经过高等教育培养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这样的新闻记者既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更是“社会的捍卫者”。可见,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立足大学讲坛,首先不是以“学理”,而是以“精神”。

分析新闻学的性质和新闻教育的特征,可以得知,要搞好新闻教育,一般应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教学实践阵地,一个是学术自由氛围。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的新闻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跻身全国新闻教育界的前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具备这样的两个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教育是朱九思先生(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于1983年创立的。朱九思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老新闻”。他1938年投奔延安,1946年6月调到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后历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群众日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天津日报》总编辑兼天津广播电台台长,《新湖南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作为“老新闻”,朱九思先生根据学校学科优势和新闻学科的特点,为新闻系的专业教学和学科建设制定了“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八字方针。为了贯彻“应用为主”的方针,朱九思先生一边创设新闻系,一边创办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改革信息报》,他自己亲任总编辑,新闻系主任任编辑部主任,教师当编辑,学生任记者,把教学与实践融为一体,既培养新闻人才,又制作新闻产品,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的光辉篇章。

同样是为了贯彻“应用为主”的方针,朱九思先生还从新闻媒体界调进一批有实践经验的记者、编辑组成了新闻系最初的教师队伍。在他看来,新闻系教师有新闻实践经历比博士学位更重要,他严格规定,没有新闻工作经历的人没有资格担任新闻系的专业课教师。教师“干新闻,教新闻”,学生“学新闻,干新闻”,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区别于全国其他新闻系的显著特色,并形成了光荣传统。

朱九思先生还特别倡导大学要有大学精神。他说大学里“还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要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讨论,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探索与发展》,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210页)新闻系创办后,他支持创办了学术刊物《新闻探讨与争鸣》,鼓励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学术自由氛围,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新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土壤。有一个典型例子:进入21世纪,这里引进了“前卫”新闻学者孙旭培先生,并为他营造一块可以放心、安心、静心做学问的绿洲。孙先生在这里工作了10年,教学上深受欢迎,被学生推选为“我最喜欢的导师”;科研成果丰硕,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孙旭培先生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以在这里10年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果向世人表明,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提倡“独立之人格,自由之讨论”的学校,是一



所有大学精神的学校,是学者做学问的好去处。完全可以这样说,这里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能走在全国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里的“大学精神”。

以上两条,是一般规律,是“入主流”。此外,华中科技大学办新闻教育还特别注重特色发展,建系之初提出“应用为主,交叉见长”八字方针中的后四字就表明要走特色发展之路。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建系筹备组组长姚启和说:“在理工院校办新闻系,要走文、理、工科相结合的路子,发挥我校理工文管相结合的优势,这是开始建系时就明确提出的指导思想。”在建系10周年的时候,他又说:“以后在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发挥学校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优势,适应时代要求,以应用为主,以交叉见长’的办系方针。10年的办学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文理渗透”、“交叉见长”的方针越来越显示出远见性。

任何一项新传播技术的出现,都会孕育出一种新传播媒介,随之带动传播观念的更新、传播手段的进步和新闻传播人才观的变化,从而促进新闻传播教育的革命。原校长周济院士深有体会地说,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新闻传播类专业办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以强大的理工科为背景,实行学科交叉,发展特色文科。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这里的新闻教育在“学科交叉”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1997年初,新的学科发展思想和办学理念基本形成,可以概括为:实行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传播文化与传播科技紧密结盟,培养既有扎实人文、社科功底,又能掌握现代传播工具的现代化新闻与信息传播人才。1998年,学院成立时,周济校长还特意命名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并于当年在全国首创网络新闻专业。经过几年“文理交叉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的研究与实践,培养“文理交叉复合型新闻人才”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品牌。

一句话,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既“入主流”,又“创特色”,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独树一帜。

这套文丛,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入主流,创特色”的产物,它沐浴着喻园“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阳光走来,体现了“应用为主,交叉见长”的教育理念。这套文丛中,有的偏重学理,也有的偏重术理;有纯文科的,也有文理交叉的。但无论哪类文章,都有较高的质量——理论探讨言之成理,应用研究有可操作性,很值得一读。

吴廷俊

2010年6月于喻家山下喻园小区寓所

# 我们还要说些什么

## ——代前言

改革开放 30 年了,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时下,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

30 年来,我们说了许许多多,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话没有说,在纪念 30 年的日子里,应该说需要说——

总结教训比讴歌成绩更重要。我们经过了 30 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各个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指导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必需的。但是,我以为还有很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我们以后的 30 年和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或许更有益处。

邓小平在 1989 年时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7 页,《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的讲话至今快有 20 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教育发展得如何呢?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待遇差距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

邓小平在 1992 年时还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6 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有 16 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存在不到位、不配套、落实不够等问题呢?

邓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的宏大气魄承认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邓小平主动检讨并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但这绝不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事。对于这种全局性的失误,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还有谁应该对这些失误负责任。自然,这种检查不是为了追究哪些个人,而是反思有哪些因素束缚着中央的思想,有哪些环节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机制是否还存在着问题,以后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往深里面思考,除了邓小平说的这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小一



点但在某地或许是“最大”和“大”的失误呢？十分遗憾，读了很多文章和领导人的自传，除了看到邓小平的自我检讨外，没有看到有关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反思，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以为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党，不怕在检讨批评中成长。“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人总是喜欢听好话，一个政党也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里有一个“奖励中枢”使然，所以从小到大，从平民到领导，没有一个不喜欢听好话的。因此，研究一下奖励学，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实施微笑服务十分盛行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体制和机制上研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创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和研究氛围，在我们这个有着封建专制长久历史的国度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不是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么？我想，认真地不讲情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的教训和失误，这也应该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吧。

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需要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9页）。恩格斯也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4页）。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做得不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许有它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总结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中去。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犹如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花了也是冤枉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

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更为严重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扛着这样的“摸论”,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己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让理论界的学者们讨论来争辩去,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这样或许需要花一点茶水费,这样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比起那些盲目的“过河”者来说,这样的“学费”会更少。“猫论”也是如此。能够抓住老鼠的猫的确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问题是,我们的科学界、理论界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白猫抓老鼠,还是黑猫抓老鼠,或是根据需要实施基因工程让白猫或黑猫变成抓老鼠的好猫呢?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好,效率不是更高么?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对理论和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够。30年过去了,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呢,对理论思想领域的管理应该更加科学更加宽松一些呢?大家都知道“头脑风暴法”很好,也都知道“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我们能否提倡一种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让一切热爱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都能够充分地接受信息,发表意见,哪怕这些意见是错误的或被人们认为是错误的,都无妨——时间可以作证。

30年来我们伟大成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鼓励人们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意识。不论是农村的承包责任制还是企业的自主权改革,不论是珠海的科技重奖还是医疗住房的改革,中央都在鼓励各地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拿出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举措来。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欣慰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因此而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改革的路,发展的路,是在继承前人成功又超越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着未知的领域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路。在这里,既要有不畏艰辛不怕荆棘的开拓者,也要有为着既定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实践者,更要有善于学习和借鉴、敢于批判和否定的创造者。但愿这一切都能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行进,在宽容失败和宽容错误的环境里发展。

30年来,通过上下的努力,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相对过去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状况正在向着“说了不白说”的进步发展。但是,还不够。在这个舆论不一律的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或领导人喜欢用“一律”、“一



言堂”和所谓的“主流声音”来代替议论纷纷的正常秩序。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发表文章批评了别人的观点或意见,却又不许别人回应和辩解。这种论辩中的不对等状况,与民主法制相悖,于思想繁荣不利,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改善的。

30年太长,只争朝夕。3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有一瞬间,但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却占了一半的时间,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相比,与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夺取政权的28年时间相比,还是太长了一些。即便是在个人的自然生命时间里,30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们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为此,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先人,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中华儿女成功了;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世界,我们承担了国际义务,中国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30年的时间还是太长。至今还有不少明知错了的理论大家还都认可,明知错了的行动上下都还在做。在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些错误盲目的理论是否需要批判抛弃(特别是一些花了巨资打造的所谓“工程”是否科学有效),那些应该甄别平反的历史是否应该列入议事日程,那些违心昧心的假话空话套话能否少说(包括那些社论中开头结尾的话和领导报告、大会主持人开头结尾的话),那些扰民损民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能否少些再少些?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很强韧性的民族,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好事将会越来越多,不希望看到的坏事将会越来越少。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正义必定要战胜邪恶,英雄终究会打败小人,冤案必定会昭雪!但是,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事在人为,世上好多事情都是在人们的主观努力下能够实现的,所谓“时机不成熟”,非不能,是不为矣。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得好的事,既是行为人的义务所在,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搪塞和推诿,我们不能不做那些子孙后代期盼赞誉的好事,也不能去做子孙后代会惋惜斥责的坏事。我们不能老是活在自己的后悔和后人的指责中,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后人。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政治民主的大潮,是任何人和任何领导集团都无法抗拒和违背的。顺应时代潮流,也就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共产党人打天下创伟业的宗旨所在,舍此,还有什么呢?30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这样,才能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快一点缩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快一些好一些。



2008年10月,《南方周末》的评论周刊推出了一期“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特刊围绕“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征集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来稿。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编辑部认为,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民之本。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当我们的各级领导和普遍公民都能够做到以双方互为尊重、保障、热忱和责任时,我们的国家不是会以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繁荣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30年后,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自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已经和正在说的变为现实。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契机,但愿我们以后日子能说好一些话,更做好一些事。

赵振宇

(此文曾为《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赵振宇著,2009年9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言,本书有删节)

# 目 录

## 第一编 新闻理论探索

- 关于报纸理论宣传的现状和意见……(1)
- 新闻宣传要增强建设意识……(9)
- 党报要在“服务”上下工夫……(13)
-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20)
- 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的中西方文化传播……(31)
- 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关于修改“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两句话的思考……(46)
- 加强听证制度的程序化建设……(58)
- 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关于新闻评论的三点理性思考……(65)
- 新闻及其时空观辨析……(74)
- 关于修改《国旗法》和《游行法》的思考……(89)

## 第二编 新闻业务研究

- 报纸理论文章的写作……(97)
- 评论选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106)
- 调查报告写作谈……(109)
- 谈谈编辑的责任意识……(112)
- 资料在新闻工作中的运用……(119)
- 练好写消息的基本功……(124)
- 新闻策划的前提及方法……(130)
- “号外”也是新闻纸……(137)
- 在“三贴近”中抓好评论选题……(140)
- 论新闻评论的根本特性……(145)



新闻报道策划的发展历程及现实责任……(156)

### 第三编 新闻人才培养

换一种角度谈敬业……(163)

加强新闻院系与新闻媒体的联手合作……(169)

论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实践与思考……(174)

学生是学校的名片……(184)

敬导师更要重老师……(186)

论当代新闻人的特质培养与教育……(188)

着力培养媒体需要的新闻人才……(197)

再接再厉,抓好新闻评论特色教育……(202)

积极探索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208)

关于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的再思考……(214)

人才招聘“四不问”……(221)

学制缩短,如何提高新闻学硕士的动手能力……(223)

加强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教育……(229)

### 第四编 新闻改革思考

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237)

人事档案应向本人开放……(239)

“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辨析……(241)

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243)

新闻媒介应展示领导工作的过程……(245)

谁来判定有无新闻……(247)

学术争鸣与赏罚机制……(249)

关于中国新闻奖评选的几个问题……(251)

本报慎用“著名”……(255)

谁的文章长……(257)

思想的痕迹莫要改……(258)